

古书版本学概论

李致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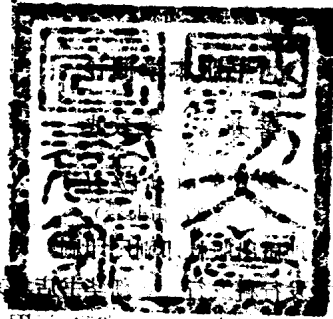


2 032 7764 9

620/30/18

古书版本学概论

李致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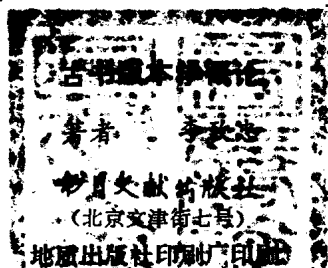


书目文献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论述了古书版本学的起源、发展，以及鉴定古书版本的方法和基本知识。作者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阐发，较同类著述更具深度和广度，富有新意。本书对初涉版本学者，是入门知识；对从事古书版本研究者，有参考价值；对有关院校学生，可先作教材。

本书所选书影，均为北京图书馆珍贵藏品，其中一部分是世人难得一见的珍品。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8.625印张 插图32幅 200千字
1990年8月北京第1版 199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13-0810-1

G·214·定价：4.95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古书版本学的起源与演变	(1)
第二节 善本简论	(9)
第二章 版本鉴定的经验与知识	(19)
第三章 造纸术的发展与古书用纸的演变	(27)
第一节 造纸技术的发展	(28)
第二节 古书用纸的演变	(39)
第四章 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49)
第一节 雕板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49)
第二节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73)
第三节 雕板印书与活字印书的鉴别	(90)
第五章 历代刻书的特点	(99)
第一节 宋代刻书的特点	(99)
第二节 元代刻书的特点	(107)
第三节 明代刻书的特点	(111)
第四节 清代刻书的特点	(116)
第六章 古书的装帧	(121)
第一节 帛书及手写纸书的装帧	(122)
第二节 纸书的册叶装帧	(126)
第七章 古书版本鉴定	(143)
第一节 依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	(143)
第二节 依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	(148)
第三节 依据后人题跋识语鉴定版本	(155)

第四节	依据原书刻工鉴定版本	(163)
第五节	依据书中讳字鉴定版本	(170)
第六节	依据地理沿革鉴定版本	(175)
第七节	依据机构职官变迁鉴定版本	(179)
第八节	依据街名尊称谥号鉴定版本	(184)
第九节	依据书名冠词称谓鉴定版本	(190)
第十节	依据卷端上下题鉴定版本	(194)
第十一节	依据卷数变迁鉴定版本	(199)
第十二节	依据藏书印记鉴定版本	(204)
第十三节	依据著录鉴定版本	(211)
第十四节	依据原书内容鉴定版本	(216)
第八章	古书的版本造伪与鉴别	(223)
第九章	校勘在古书版本学中的地位	(235)
第十章	古籍版本著录与编目	(243)
第一节	版本著录方式与版本著录称谓	(243)
第二节	古籍编目与版本学的实现	(265)

书 影 目 录

- 图一 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卷首扉画
- 图二 五代刻本《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 图三 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
- 图四 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河东先生集》
- 图五 南宋临安陈宅书籍铺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
- 图六 南宋临安荣六郎书籍铺刻本《抱朴子内篇》
- 图七 北宋开宝六年刻本《佛说阿惟越致遮经》
- 图八 元大德九年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梦溪笔谈》
- 图九 蒙古定宗四年张存惠晦明轩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牌记
- 图十 明洪武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刻本《天竺灵签》
- 图一一 明永乐郑和刻本《佛说摩利支天经》扉画
- 图一二 明万历程氏滋兰堂刻本《程氏墨苑》
- 图一三 明万历三十年草玄居刻《仙媛记事》《裴航云英相会图》
- 图一四 明末刻本《十竹斋画谱》
- 图一五 清康熙内府铜版印本《耕织图诗》
- 图一六 清顺治刻本《离骚图》
- 图一七 清康熙印本《芥子园画传》
- 图一八 清康熙五十八年泰安徐志定磁版印本《周易说略》
- 图一九 清道光二十四年翟金生泥活字印本《泥版试印初编》
- 图二〇 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农书》
- 图二一 明正德十五年铜活字印本《艺文类聚》
- 图二二 宋蜀刻本《孟东野文集》
- 图二三 宋闽刻本《汉书》
- 图二四 宋浙刻本《王建诗集》
- 图二五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 图二六 旋风装示意图

图二七 经折装示意图

图二八 梵夹装示意图

图二九 蝴蝶装示意图

图三〇 元至正十六年翠岩精舍刻《广韵》牌记

图三一 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木记

图三二 宋刻本《文选》条记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古书版本学的起源与演变

中国古书版本名学，其来尚矣。然而既名版本学，其确切概念当然应该是起自雕板印书之后，故前人论及版本学，多称始自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的确，自宋代尤袤编制《遂初堂书目》起，始在一书之下著录多种不同的版本。原因是进入宋代以后，雕板印刷的书籍已蔚为大观，无论经、史、子、集，佛经、道藏，均有许多不同的雕印本行世。版本既多，本与本之间就会产生内容、卷数以及文字等方面的差异。读书人为了获得真知，就不能不考究版本的优劣，比勘各种版本之间的异同，以便判别是非，得出正确结论。为了适应读书人的这种需要，目录学家在编制目录时也就改进编目体例，调整著录内容，增添不同版本的著录项目。版本学就这样慢慢地形成了。这是确切含义上的起源期的古书版本学概念。但是在实践上，古书版本学的这种内涵，远在雕板印书术出现以前，那时人们讲究传本的风气早已有之；而在雕板印书术大兴以后，研究版本的人也绝不仅仅就是研究各种印本，而是把稿本、写本、传抄本、批校题跋本等的研究也包容在内了。

全面研究古书版本学的这种内涵与外延，才是中国古书版本学所应承担的全部任务。

《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给这句话作注，说“真，正也。留其正本”。其意是说，河间献王刘德是位很重视文化遗产的人，他从民间得到“善书”，就很好地抄写一部，送还给书主，而把原来的正本留下自己收藏。同时他还用金帛重价收买天下遗籍，因此“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故献王“得书多，与汉朝等”。这段记载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早在西汉景帝时的河间献王，就已经很注意旧本、传本了。按说，从民间得到“善书”，抄录一部留下自己珍藏，就内容而言本无可。可是他却不这样做，偏偏要好好地抄录一部奉还原书主人，而把原来的正本留作自己珍藏，这无疑是在考究传本的先例。“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以求善价，更进一步证明了河间献王刘德珍重旧本、传本的史实。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受命整理国家藏书。在大规模开始整理之前，汉成帝曾接受奏请，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搜访遗书，从而使群书毕备，为刘向的整理工作提供了先决条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这次整理有较细的分工，由刘向总其成。亦有清晰的工作步骤和层次。大体是备众本、校异同、删重复、订讹脱、谨编次和撰叙录等程序。显然，备众本成了这次整理工作的首要环节。因为众本不备，就无法校订异同；不校订异同，也就无法删其重复；重复不删，也就无法条其篇目；篇目不定，更无法撮其旨意；旨意撮不出来，叙录就无法撰写，最后也就无法录而奏之。足见刘向也是十分重视书籍的各种传本的。

南北朝时的颜之推，在其《家训·书证篇》中，也曾在一书之

下列举过众本，如“江南本、河北本、俗本、江南旧本、江南书本”等。其意也是著录各种传本，区分各种传本，以便提供人们比勘各种传本的优劣异同。此亦为雕板印书出现以前人们就已经考究传本的实例。

唐初，经书混乱，李世民曾于贞观四年（630）下令：“经籍讹舛，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证。”（见宋孔平仲《谈苑》）这也是珍视旧日传本的实例。

进入宋代以后，雕板印书蔚然成风，一书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刻本、传本，人们对版本的考究也就更加突出，以便择优汰劣，获取真知。岳珂校刻《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以家塾所藏唐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蜀大字旧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婺州旧本……凡二十本，又越州旧本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这更是注重不同版本的先例。

从以上简单的几例，不难看出，早在雕板印书大兴之前，人们就是非常讲求传本的。其意义与后来的讲求版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亦不过是区分优劣，校订异同。不过那时的书籍还是靠手写传抄而流布，尚不是靠雕板印刷来流传，所以不好直接称为版本学。但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和后世确切概念的版本学，在内容上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因此，确切含义的版本学固然是起自大量的雕板印书之后，但就其内在的真义讲，则是早自西汉就已经起源了。

同样，雕板印书大兴之后，版本虽已名学，并且逐渐自立于学术之林，那么是不是说人们就只研究版本，而不顾及其他一切写本和传抄本了呢？也不是。即使是再往狭义一点讲，就以版本学中最核心的内容版本鉴定而论，也很难想象只是鉴定版本、印

本，而绝不涉及写本或抄本。事实上，虽以版本名学，其内容却外延至对所有印本、稿本、写本、抄本、批校题跋本的识别与鉴定，甚至包括对朝鲜、日本早期用汉字雕印、活字排印或手写传抄书籍的识别与鉴定。从这个意义上讲，雕板印书大兴之后，版本学的内涵也没有只是局限在对版印书籍的研究上，而是把各种方式生产出来的书籍，都包容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了。

上面是就中国古书版本学的纵向发展讲的，如果要谈古书版本学的横向内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从属关系，则就更不只是个鉴定版本问题了，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早在版本学自立于学术之林以前，版本学（早期或称为传本学）应当是从属于校勘学的。西汉刘向受命整理国家藏书，首要环节虽然是备众本，但目的还是为了校异同、订讹脱、条篇目、撰叙录。将各书叙录集中而别行，这就是《别录》。待到刘向的儿子刘歆进一步将各书叙录析出，经过分类编排而单行成为一书，便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目录学专著——《七略》。而《七略》一出，从内容、体例、分类、著录等诸方面，均奠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七略》凡录一书，必著其书名、篇什、学派、家数、传本等，这样，版（传）本学又从属于目录学了。所以说，版（传）本学最初是为校勘学服务的，而通过校勘，辨别出版（传）本的异同优劣，再通过目录著作表现出来的一种学问。因此，版本学自最初的意义讲，便紧紧地和校勘学与目录学联系在一起了。故探讨什么是中国的古书版本学，决不该脱离它所脱胎的校勘学和借以表现自己的目录学。

长期以来，世人多言版本学，但有系统、有体例地论述版本学，始终是个难题。这并不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学人才子，也不是因为这门学问多么高深莫测，无法问津，而是由于这门学问有

它自身的特殊性 & 特殊的运行规律。它常在于枯燥无味的校勘中，通过它，书籍的优劣异同就会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而后通过撰写题跋，编制目录，再把人们对它的认识和品评表达出来，这一点是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上的天然特点。由于它只表现工作过程，而无独立形态去表现自身的结果，表现出来的多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目录著作形态，故很不容易为人所认识和琢磨。试看古今的版本大家，如晁公武、陈振孙、钱谦益、钱曾、毛晋、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陈鳧、顾广圻、鲍廷博、杨绍和、瞿绍基、叶德辉、傅增湘、张元济等等，他们的版本学功力，无一不是透过编制目录或撰写题跋识语表达出来的。这就是世人多言版本学，而版本学又长期没有独立形态的根本原因。

版本学靠校勘学获得对书籍版本异同、优劣、系统的认识，借目录学著作来实现自己的功用，其研究的内容自然也要受目录学的制约。中国的传统目录学著作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如果单从著录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目录学著作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簿录式的简单目录，一类是著录内容较为丰富的提要目录。简目的性质似是图书的登录账，姑置勿论。提要目录便于把图书项目著录得十分翔实，诸如书名的命意、卷数的分合、著者的生平爵里、写作的要义、编撰的体例、版刻的时地、版本的系统源流等等，都要一一加以揭示。提要目录学专著的这种著录编目体例，发端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而定型成熟于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陈以降，提要目录的著录内容、编制体例等，虽然也有不小的发展变化，但总的看来却未出晁、陈规制。提要目录于图书的这种揭示范围，也就基本决定了版本学的研究内容，也 无非是从书名的命意、卷数的厘订、写作的要旨、编撰的体例、成书的经过；作者

的行实、科第爵里；版刻的时地、版本的源流、名人的批校题跋、递藏关系等诸方面，加以揭示和著录。这就又和目录学融为一体了。所以后世常常有人把版本学又说成是版本目录学，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版本学也有自己的脊梁，其核心内容便是版本鉴定，此在宋朝已发其端。只不过那时前代流传下来的古刻旧刊较少，多为本朝印本行世，鉴定任务尚不突出。入明以后，特别是入清之后，宋、元都已成为历史，其时所流传下来的写本、印本书也成了古籍而陌生了，故鉴定古书的版本，开始从目录学家那里向藏书家和书贾方向游离，并逐渐演变为貌似独立的技能。

中国历史上的明、清两代，藏书家极盛。盛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作学问的需要，特别是清代考据学大兴之后，为了搜集可靠的资料，学者们便尽可能收集众本异书，于是藏书家蜂起。二是社会风尚，公子王孙、王公大臣、封疆大吏、文人墨客，几乎都要收藏一点古刻旧刊、名人字画、古物碑帖，这样便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受这种风气影响，乃至于乡村豪绅、富商大贾，虽然只是粗通文墨，却也要收藏几本好书，几幅名人字画，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民国初年和北洋政府时期。目不识丁的军阀头子也要藏书刻书，经商致富的买卖人居然也插架宏富，四壁图书。这些藏书家，有的为了学问上的需要，不得不再学一手鉴定版本的技能；有的虽无甚学问可作，但为了附庸风雅和满足茶余饭后的欣赏，于版本鉴定也得说出个子午卯酉。久而久之，版本鉴定便逐渐独立出来，沿着藏书家的道路发展。

为了适应藏书家的学问需要或鉴赏需要，社会上便又生出一批书贾。这些书贾有的开张立铺，有的行篋为家。为了赚钱牟利，他们不惜频年奔走，南泛苕船，北游厂肆，乃至走乡串户，

苦索冥求。一旦得到宋刻元刊、古写旧抄，又不惜望门投送，以求善价。这些书贾，无论是买进或卖出，于古书版本非鉴定准确不可，否则就要吃亏上当，蒙受经济损失。这样，古书版本鉴定在书贾行当中也成了独立的东西，又沿着书商的道路发展。

这两条道路发展的结果，便生出了从印纸墨色、字体行款、版式风格、书口鱼尾、刻工讳字、藏印题跋等方面鉴定古书版本的新方法新途径。久而久之，又有人出来加以总结，象明代的高濂，清代的孙从添，民国时期的叶德辉、张元济、傅增湘等等，都讲过很精到的话。本世纪五十年代，北京中国书店更以《古籍版本知识》为名，将这些鉴定经验编写成书，油印行世。浙江省图书馆毛春翔先生亦撰写专著，以《古书版本常谈》为名，付中华书局正式出版。随后不久，又有辽宁省图书馆陈国庆先生著书立说，名《古籍版本浅说》，亦付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到八十年代中期，原北京中国书店魏隐儒先生，又以《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为名著成专书，由印刷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中国古书版本学，似乎是真的离开它的胚胎校勘学和借以表现它的目录学而独立成书成学了。

其实，版本鉴定并不是古书版本学的全部内容，且鉴定仅靠直观判断也还不行。直观判断只能说出个大概，绝难说得具体，更难依此做出科学的结论。因为直观判断更多地是靠人的眼力去捕捉书籍表面的特点，这就容易在两方面产生问题。一是眼力属于人的主观因素，凡属主观的东西就难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二是书籍浩如烟海，形形色色，一般说来虽有时代特色和同一时代的近似风格，但特例的情况也并不多。主观经验和特例相遇，就容易发生错误。所以把这些独立出来，做为版本学的自立体系传播是不够全面的。只有还版本学的本来面目，借用校勘来断出版

本的优劣，理出版本的系统源流；再运用史实考出版刻时地、主刻之人及刻书缘起，再进一步理出不同版本间的篇卷分合、内容增损等，这才是版本鉴定承担的实质性任务。这些，岂是直观鉴定所能完成！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大兴，过去的许多公私藏书，通过各种渠道向各种类型的图书馆集中。而各种类型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就是通过各种目录的编制来揭示藏书、介绍藏书、吸引读者、指导读者。图书馆目录的编制，特别是关于其中普通古籍线装书目和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制，便又使古书版本学返朴归真了。即一部版本目录专著的问世，能把这部目录编制者的版本学知识、水平、功力等，全部表现出来。若是提要目录，就更能表达编制者的版本学造诣。从这种意义上讲，版本学虽则借助目录学著作来表现，并为目录学服务，但当一部版本目录编制出来时，版本学也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便是中国古书版本学的实质。

当然，版本学，或者说初期的传本学，从它由校勘学脱胎而出的时候起，也就不完全从属于校勘学。时代越往后，它的功能与独立性也愈明显，并反转过来，又使校勘学为它所利用。同样，虽然版（传）本学一开始就要借助目录学来完善自身的机制，并借助目录学著作来完成自我表现，但当目录一形成，也反过来又为版本学所利用。那么中国古书版本学到底是什么呢？时至今日，假定一定要描绘、概括中国古书版本学的具体内涵，似乎可以做如下的表述：中国古书版本学是以中国古代图书为对象，以版本鉴定为核心，以考订为主要方法，凭借多学科知识、借助校勘学、利用目录学完成全面揭示图书任务；并忠实地为中国古代社会各学科研究服务的辅助性科学。它的表现方式虽然迄今仍多

以目录著作的形式出现，但撰写论文，编写专著，则更可从中寻求广阔的途径。至于利用不同版本之间文字上的变化差异，研究作者的思想倾向、时代色彩、政治变化等，则是古书版本学更进一步的任務，也是各方面学者共同的任務。而当着版本学真的进入到这一步，则天地不但广阔了，其价值也就发挥得更充分了。

第二节 善本简论

古书版本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面对所有古籍的，但在版本学的研究传统里和版本研究的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的，或者说是工作的重点，更多的却是善本。因此对什么是“善本”，“善本”的内涵、外延与演变，及其在理论上的界说和实践中所应掌握的尺度，简要加以论述，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善本”的最初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文字讹脱的书本。朱弁《曲洧旧闻》说，宋人“穆伯长好学古文，始得韩、柳善本，欲二家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还说：“宋次道家藏书，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讎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周輝《清波杂志》说，宋“庆历间四库书搜补校正，皆为善本。”元延祐六年(1319)陈良弼为《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作序，说宋人赵与簠以为严陵本此书字小且讹，“于是精加讎校，易为大字，成为天下之善本”。宋人李文叔序《战国策》叹称：“今《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而舛错不可疾读”。宋沈揆序《颜氏家训》，称“揆家有闽本，尝苦篇中字迹难读，顾无善本可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八说：“《元和姓纂》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

七八。后又以蜀本校，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江少虞《事实类苑》记载：“宋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北周书，罕有善本，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上述所有事例，归结到一点，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即最初人们关于“善本”的概念，就是指校勘精审，无文字讹脱的书本。

但是，校书犹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抄写、刻印一部书，怎么敢保一个错字没有呢。因而在实践上，人们是把善本的原初概念同对善本书的遴选并不等同看待。前一节我们提到的河间献王刘德、颜之推、唐太宗李世民、宋岳珂等，在遴选、运用、入藏图籍时，就都很重视传本、旧本。这就和“善本”的原初概念不尽相同。虽然传世的旧本，在文字内容上可能更接近原书面貌，但也并不尽然。可事实上不仅上述诸人重视传世旧本，越往后世，珍视传世旧本的人越多，心越重。这就在实践上等于又提出了一个概念，这就是“珍本”。珍本就是珍贵的版(传)本，虽然珍贵的东西并不一定尽善尽美。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罐，谁都得视为珍贵的文物，但今天人绝不把它看做是得心应手的器皿。敦煌石室的任何一卷写经，谁都得把它视为珍贵的传本，但在文字上却未必就精就善。可是不管怎么说，珍贵的东西人们还是格外重视。

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把“珍”、“善”合流了。

清末张之洞为了指导学生读书，曾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自